



申海

香港是繁华之都还是文化沙漠,囿于单个人的视野,不免见仁见智。但香港亦中亦西、不中不西的环境却成了金庸等人扬名立万的山头。

文化沙漠也好,繁华之都也罢,无论如何,人离不开生活的环境,陶杰身上自有着香港的包罗万象和开放多元,所写文字也是囊括社会各个层面,五花八门。当年他被金庸从英国收罗,在《明报》副刊写作,一出手便技惊四座。他写英国的留学时光,所历种种,看似随意点染,但却涉笔成趣,绝非单纯地叙写当地风土人情,记录美景美食,没有走马观花的轻狂和做作。在对英国社会的观察中,无媚态亦无意气用事的敌对态度,而是带着自己的眼光和思考,因此认识与见解非一般人所能为。他写

英国的天气:“英国的细雨,构成气候的基本语言。若一部中国近代史的页面渗透着血泪,则英国的九百年历史翻开,字里行间,必滴着无穷的雨水。英国绅士与政客心态隐晦,连欧洲人也难以相通,一如英伦天气的云情雨意之不易捉摸,岂是偶然?”若非沉潜其中并配以丰富渊博的知识及机敏的才气,断不会有这般文字。

陶杰出身学院派,文章却没有学院式的枯燥无趣。他描绘萧红:“因为她只有一颗单纯的心,没有精练的文字技巧,努力绽放的,是生命本身的热烈姿态。可叹萧红自己像一个杂耍艺人,在生与死这条钢丝上步履维艰……云散呼兰,水涵香江,萧红扔下笔,抛下爱情,她没有余音,死亡是她的休止符,结束一切折磨。”真是句句入情,字字入心,可谓萧红异代知己。相较一力追求雅致、贪恋“旧时月色”不食人间烟火气的董桥,陶杰的文字更能激荡人心。

有着十几年的留学背景,陶杰却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切眷恋和喜爱,在被一些人封为“文化沙漠”、八卦横行的香港,其让人看到的形象,是一副磊落青衫,是一颗爱恋拳拳的中国心。他重视语文和古代诗文,把它们看做民族的性灵所在,并从英国少年视读莎士比亚为畏途想到自己身边的情形,对社会只追求经济增长却将语文弃之如敝屣的做法痛心疾首。同时,对香港留学生在国外的整天胡混和不学无术,他也没有客气,极力针砭。有趣的是,同样留洋并常在香港逗留的学者李欧梵却与之大异其趣。李认为《肉蒲团》原文不够精致,失之粗糙,反不如其哈佛大学同事翻译的英文让他看得津津有味。香港非典期间,李欧梵想到了文艺的力量,建议大众看一看加缪的小说《鼠疫》和德国经典科幻片《大都会》。面对一些留洋生的不堪情形,觉得电影《英国病人》矫饰空洞的陶杰的做法是等到深夜看一部旧粤语片,看演学生的罗剑郎如何登上大火船负笈远洋,在影片的黑白意象中,他声音能寻找到留学生昔日洁净的灵魂。李与陶的行为做法,让人在情感上不由更愿偏向于后者。

香港地方狭小,寸土寸金,虽然报纸有上百种,人均占有率居世界之冠,但多为娱乐文章,走的是通俗路线,且多短篇,便于生活在快节奏中的居民浏览。陶杰身处其间,专栏文字也似居所一般讲究节省,金大侠及其他东家都没有提供太多的版面,在这样的局面下,一些事件和事物便得不到透彻的解读。陶杰认定香港的英国文化不伦不类,以下午茶为例,虽是喝的西式下午茶,得到的却是粤式茶楼的服务。这固然是置身香港的清醒人的看法,只是论及香港的英国文化来,仅举下午茶这一个例子实在不过瘾,若是能旁及社会生活的多个角落和事物,才算撑得住英国文化这个大主题,也才能像端出水陆全席那般,让人满眼开阔,进而大快朵颐。

我愿意用“天赋异禀”来形容简墨。她一直怀着恣意翱翔的憧憬规规矩矩地低头做事。她是耕作者,同时也是长在大地上的植物,有自己的平凡和与众不同,在晨曦里,在暗夜中,扎实地蛰伏,聚敛自己独一无二的气息,等待,在适宜的光合作用下突然昂首绽放,向着世界安静地喧哗。这适宜的光合作用就是创造性的写作。

简墨近年来致力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深度打量与触摸。她基于事实又超越事实,以人为本,将顽强的个体生命意识体现得酣畅淋漓,让那些被封存和强制沉睡的心灵苏醒过来,生动起来。优秀的散文家熊晋群说:“文化只有与个体的生命结合才是活的,那些活在每个心灵之上的文化才是我们能够感知的。否则,它就是知识,是脱离个体感知的抽象的文化知识,这样的写作是知识传播,而非文学的性灵书写。”

我以为,《二安词话》正是对性灵书写的更为开放和深入的探索。简墨之所以选择“二安”这个主题,是因为“他们牵手,在一个高速运转、胀满欲望和样样粗糙的年代,将我们引向清静,引向优雅、智慧和精神力量,为我们重新诠释了爱情、理想、信仰、牺牲等美好的字眼,让我们确信,他们还没有离我们远去”。对于李清照和辛弃疾,简墨没有对他们的身世、经历、作品架构进行按部就班、模棱两可的程式化解读,与以往的同类作品相较,《二安词话》有罕见的特质。我们在作者笔下看到的是对于人物的一种不确定的由此及彼的联想,一种设身处地的揣摩推理,一种浑然天成的浓厚诗意。它是一个由片段、瞬间、命运的偶遇及由此引发的思索和感知融合而成的独特审美关照下的个性化文本,其中连绵的意象和流动的气韵烘托出了强烈的现场感,把二安从千篇一律、人云亦云的重复考据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成为历史余晖与现实光线映照下的活生生的两个人:一个,“时刻准备着出发,然而,最后只能原地踏步,任时间流去,一寸寸,老尽少年心”;而另一个,青春和幸福都“短暂得如同书里的插图,生活的大书却总书写了太多苦难作为正文。那些愉快的小浪花还没来得及翻卷,国家不幸的大潮就来了……繁华落尽,梦醒了。自此,她一寸不剩地失去了她的乐园”。

简墨在充分掌握相关史料的基础上,用发散性与过滤性相结合的思维方式,提炼出人物的代表性特征和作品的核心意象,然后以此为中心展开大写意式的散文化叙事,力求还原李清照和辛弃疾的多面性,描摹他们百感交集的精神世界。在解读辛弃疾那首著名的《青玉案》时,简墨围绕“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个核心,写了那个“他”:“当然是他,那个被抛在人群背后,神色荒凉的中年男人——那就是他啊,这个与他的时代心性不和的、妄想不成的英雄,被迫而成的诗人。”紧接着,又用极具现代感的英国歌手詹姆斯·布朗特一支流布全球的曲子转换了空间:“在人海拥挤之中,我见过她的脸,在我们擦肩而过的瞬间,她应该从我的神情看出我欣喜若狂飞上云霄。我想我再也看不到她,但我们分享了永恒的片刻。”之所以这样衔接,是因为“他们传达给我们生命中最美好、最深刻的部分,就这一点而言,没有什么东西西方之别”。简墨站在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和精神诉求的相通之处,大胆而巧妙地打破古今中外的种种界限,用她那烂漫瑰丽的想象力和触类旁通的融合能力顺利跨越了时空和地域的重重阻隔,也成功抵达了阅读者的内心。

任何一种美好的书写都应该具有强烈跳动的生命体征,文字是有呼吸的,是可以自由奔跑的,是可以传达出灵魂和情感的纹路甚至气味的。透过《二安词话》,我又一次看见了简墨这个大自然培育出来的修辞分子的那种“埋头造自己的句子”的状态,她的温暖和执着必定会让花朵更像花朵,让春天更像春天。

朱向泓

【闲读随笔】

修容与饰性

周鲁霞

伦敦奥运会期间,国内一电视台造访大英博物馆,得以一睹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之“芳容”。其实《女史箴图》真迹渺然已逝,现存大英博物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馆的两幅,分别是唐、宋时期之摹本,只是大英博物馆所藏艺术及学术价值最高,时间最早。

《女史箴图》的创作目的在于教化,一段宫中雍容女子对镜装扮的图画旁边,题着如下箴文:“人咸知修其容,莫知饰其性;性之不驯,或怨礼正;斧之藻之,克念作圣。”大意是:人们通常只知整理自己的容颜,不知涵养自己的品性,而后者才是最重要的。为挽日下之世风,创作者“苦口陈箴、庄言警世”,可谓用心良苦。

大概是因为顾恺之的“游丝画法”和“传神写照”使画面太美的缘故,今人已较少能体味到教化之意图,甚至会萌生作者牵强附会、小题大做的感觉。爱美是女子的天性,不过照镜子略施粉黛,难道修其容与饰其性真的就如鱼和熊掌一样不可兼得?英雄花木兰不是也“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吗?再说,若顾恺之有如今日女子已经到了刀切斧斫动辄万金还可能命丧手术床之后,又该如何去画并施以教化?

豪华盛宴并无上之鱼就不能上熊掌,上了鲍鱼就不能上海参的硬性规定,面容姣好且贤淑文雅的女子虽不常见却也偶能睹之。皆我所欲的鱼与熊掌之不可得兼,其实只是孟老夫子的一个道德假设。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走极端。据说,《女史箴图》讥讽的是西晋惠贾皇后,此人就是一个极端,她的“极端”不在于身材矮小、相貌丑陋,而是专权暴戾、冷血荒淫,终至祸国。

人之潜意识中永远潜伏着对权力的渴望,而权力又本能地趋向于恶,所以,“文明的核心目的一直就是规训此种欲望,不使其超越界限”。这也是古今先哲总把权力与德行紧密相连的原因所在。我感觉,“无敌丑女”惠贾皇后的历史故事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平常女子偏重些表面文章、忽略点内在德行其实并无大碍,而一旦权力在握又德行有失,后果便会严重起来,可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并且是权力有多池子便有多大。若此,拿寻常女子说事的《女史箴图》,也是对权力的陈箴、规训。

修容与饰性,就像行动的生活与默想的生活一样,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行动的生活与默想的生活也并非不可得兼或截然能分,但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文化中,两者确实会有所偏废。古希腊哲人、基督教文化追求默想的生活,古罗马帝国则是一种行动的生活。儒家文化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貌似追求二者的得兼,其实修行还是在前排就座。

意大利的马基雅维里最先将道德与权力进行分离,坚持认为,只要能达到抵御外敌入侵、使国家强盛、使臣民服从等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马基雅维里生活的时代与我们春秋战国有些类似,邦国林立、弱肉强食,在丛林法则的胁迫下,道德之远水难解现实之饥渴,将政治与道德进行分离也是事出有因。但马氏理论毕竟是一家之言,这并不意味着在国际秩序中作为个体的国家就可以放弃德行,国家若不正心修身,天下难以太平,招致更大的危险。

美国传统保守主义派学者克萊·G·瑞恩的《道德自危的美国:民主的危机与霸权的图谋》一书,是对自己祖国道德危机的激烈抨击。在作者看来,传统的西方道德有一个鲜明的立场,就是尽可能地完善自身、宽厚地善待他人,此种旧的道德品质也要求将“自我约束和尊重他人”的原则贯注到国际关系中去,以便“减少冲突的危险”。美国自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始,在很长时期一直奉行“尊重其他国家的独立”、“避免干预他人事务”的政策。直至二战爆发,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思想依然占据主导,以至于总统罗斯福对英、苏、中等国的援助计划步履维艰。美国的宣战缘于神秘的珍珠港事件,至今还有人推测此事件是个“阴谋”:罗斯福以珍珠港为代价来击破国内根深蒂固的孤立主义思想。正是在二战结束后,美国开始了在世界这个大棋盘上的精心战略布局,走向帝国扩张之路。瑞恩认为,就国家层面而言,在当今美国,传统的那种自我控制的旧道德,已演化为控制他人的新道德;因为美德概念的改变,责任已经从个人那里转移到政府头上,“以致政府大幅度地扩张,高度地集权化”。

文明世界,帝国的黩武和扩张定要祭起神圣的大旗,瑞恩指出,美国的单边主义、干涉主义也是由“最高贵的原则支配的”。美国自认为是平常的国家,“担负着高于所有其他国家的责任和使命”,是全世界善与恶的仲裁者,“这一远景等于一个新的美国神话:美国是一个道德帝国的统治者”。瑞恩认为,这一意识形态恰恰反映了美国文明的衰落。

“缺乏教养,只知从事实务的人几乎不可能拯救一个遭到重创、迷失方向的文明”,然而“道德上无所顾忌的行动者常常最能如鱼得水”。看似简单的修容与饰性,行动的生活与默想的生活,竟也处于尴尬、两难的困境。



《杀鸭的少女》
陶杰 著
凤凰出版社
2012年8月出版

「性情文字」

青衫磊落中国心



《二安词话》
简墨 著
济南出版社
2012年5月出版

「访古问今」

用心灵复活心灵



微博书评

◎必读呢本:“我不是来演讲的。”17岁的马尔克斯如是说。《百年孤独》大获成功后,他演讲时又说:“对我而言,文学创作和登台演讲一样,都是被逼的。”《我不是来演讲的》收录了1944年至2007年间公开演讲的名篇,时间跨度涵盖他的文学生涯。来听听他谈自己,谈《百年孤独》,谈谈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吧!

◎黄老邪:《柠檬桌子》,朱利安·巴恩斯著,收短篇小说11篇,篇篇超赞。它的每段字句都满溢着欢悦的自嘲,它的每处细节都雕刻着无敌的时间……而巴恩斯最终还是给你我那怕残喘的自信留了一两个近景,他知道,在那场“漫长而怯懦的冒险”里,我们既不像自我感觉的那么年轻,也不像他者看见的那么衰老。

◎郝景芳:《母与子》,托宾的短篇集,讲九个母子故事。这是这套书到目前为止最让我震动的一本。我是如此喜爱文字中的冷峻和深情,也许是爱尔兰文学一贯的特征。那种看似缓慢的语调,仿佛没有情节,却有情感上最大的碰撞。一个遥望的瞬间,一句突然透露的消息,一次不该发生的情欲,都将爱的痛苦表露无遗。